

克罗斯兰的“后资本主义”论

钟丽丽 蒋锐

摘要: 基于对上世纪 50 年代英国社会的观察和思考, 克罗斯兰认为英国已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 因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判断已失去正当性。以“后资本主义”论为逻辑起点, 克罗斯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修正, 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他的社会主义观。克罗斯兰的“后资本主义”论对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影响, 但他的这一理论以经济增长为前提, 认为股份公司制的出现和管理革命造就的经理阶层分散了资产阶级的权力, 使资产阶级已丧失统治地位, 这是不正确的。他在“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主义观, 也只不过是淡化了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些色彩, 实际上并没有取得重要理论进展和建立起新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 后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 克罗斯兰; 英国工党

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17.02.009

克罗斯兰是英国工党著名理论家和政治家, 他的“后资本主义”论和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影响着上世纪中期英国工党的意识形态转型以及经济社会政策。根据对战后英国“丰裕社会”的观察和思考, 克罗斯兰认为英国已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 经典马克思主义已无法解释英国社会的新变化, 因此需要重新界定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目标。基于这一认识, 克罗斯兰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批判和修正, 并构建了他本人的社会主义观。本文拟详细考察克罗斯兰“后资本主义”论的主要内容, 在此基础上厘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进而客观评价其“后资本主义”论。

作者简介: 钟丽丽,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蒋锐,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济南 250100)。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研究”(15CWHJ10);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统一战线发展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14JJD810016)。

一、克罗斯兰“后资本主义”论的主要内容

克罗斯兰关于英国已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论述，主要集中在其《这是社会主义吗》《新费边文集》和《社会主义的未来》等著作中。在这些著作中，他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新的界定，分析了二战后英国社会的新变化、新特点及其产生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性质和目标进行了重新阐释。

在1951年秋发表的《这是社会主义吗?》一文中，克罗斯兰对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工党执政6年后的英国社会进行了比较，认为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已在英国出现。他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由产业资本的私人所有制塑造的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少数资本所有者构成一个对资本负责的阶级，但这种体制已不适合20世纪中期的英国产业关系了，因为国家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且资本家的权力已被数量众多的股权所有者取代^①。

在1952年出版的《新费边文集》中，他又对资本主义做了进一步的界定，认为传统资本主义是一种先进的工业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大部分经济活动受私人利润的驱使，由私人公司来进行，政府无权进行干预，或者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是资本所有权和控制权属于资本家私人所有的产业体制，其经济决策受自由市场的影响^②。他论述了资本主义向“后资本主义”转型的必然性，并结合英、美、瑞典等国的实际情况，总结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八大特征：（1）个人财产权不再是经济和社会权力的重要基础。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方式的所有者是统治阶级，而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随着所有权逐渐转变为股权，统治阶级的权力也逐渐发生了转移，财产关系不再决定经济权力的分配。（2）财产所有者的大部分权力已转移到经理阶层手中。财产权的缩减一方面表现在高额利润已不是扩张的主要动机（尤其是在大型公司里），这使公司间的合作大大加强，另一方面表现为企业所有者越来越重视股东的要求。（3）国家权力大幅度增强，成为主宰国家经济生活的独立中间力量。国家通过对一些产业部门的直接经营，通过对其他私营部门的实际控制，以及通过财政预算政策调控总收入水平和收入、资源的分配，实现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4）社会服务水平大大提高，建成了福利国家。他认为这一特征具有深远影响，不仅消除了严重的社会不满和不安全感，带来了更多的平等，而且使政府对经济事务的高度干预成为不可避免。（5）就业水平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大规模的周期性失业几乎成为不可能。充分就业的政治压力已超过英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一个政党要想赢得选举，就必须保证就业率。政府经济活动的增加同时意味着平稳的产业投资，这对私人企业投资也有积极影响，能够促进在住房、

^① See Catherine Eliis, *The New Messiah of My Life: Anthony Crosland's Reading of Lucien Laurat's Marxism and Democracy (1940)*,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17, No. 2, p. 198.

^② C. A. R. Crosl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in *New Fabian Essays*, London: Turnstile Press, 1952, p. 33.

教育、新城镇建设等方面投入的增加，从而有助于保持较高的就业率。(6) 生产和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战争期间的经济萧条减缓了英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也降低了人们对利润、资本支出水平以及生产力提高的期望值。但在战后高就业率背景下，随着投资的增加和限制性生产的减少，英国的生产力得到迅速释放，国民收入年均增长 1.5%，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7) 中产阶级在技术和职业领域的崛起，使社会的阶级结构更加多样化。机械化导致严格意义上的工厂工人阶级人数越来越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人们对服务的需求胜过对商品的需求，随着中间阶级的心态和水平扩展到其他阶级，上层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冲突得以缓解。(8) 意识形态上，不再强调财产权、个人动机、竞争和利润，转而强调国家责任、社会经济安全以及合作的益处^①。

克罗斯兰认为，英国之所以能够实现从传统资本主义向“后资本主义”的转型，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因素非常强大，使资本主义已无法立足；二是资产阶级丧失了其在全盛时期的那种自信；三是由于技术革命的影响，私人所有权逐渐让位于经理管理权^②。工党、社会党以及有组织的工会的发展壮大，推动了英国反资本主义运动的发展，从而有效地抵抗了工业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周期性失业和社会不平等，促使雇主阶级为获取利润不得不对政府的充分就业政策改变态度，逐渐接受了政府对其经济权力的改革和干预。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高失业率、普遍的贫困等，也使资产阶级对自身及资本主义的信心变弱，他们不再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完美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而应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行相应调整。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导致资本主义自身发生了根本变化，例如公司规模扩大和有限责任法的实施意味着股权的分散化，掌握企业所有权的传统企业家日渐演变为单纯的股权所有者，公司的管理权和决策权日益转移到经理阶层手中。此外，战争也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二战期间，政府权力的强化，使英国工党所呼吁的政府计划、税收政策、充分就业、社会服务等成为现实，并得到民众的接受和欢迎。

在 1956 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克罗斯兰更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具有 19 世纪 30 年代到 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基本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特征的社会”，有以下突出特征：经济生活自治，经济决策分散到各个生产单位并受市场影响；资本家作为业主和管理者对企业享有有效决策权；企业资本为私人所有；经济权力的过度集中导致了财富分配的极不平等；激烈的阶级对抗；意识形态上崇尚个人主义和竞争，坚持绝对无条件的个人财产权，坚信自由行使私人权利的正当性^③。他结合英国的现实情况，不仅从社会经济方面，而且从家庭关系、宗

^① C. A. R. Crosl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in *New Fabian Essays*, London: Turnstile Press, 1952, pp. 42-44.

^② C. A. R. Crosl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in *New Fabian Essays*, London: Turnstile Press, 1952, pp. 37-38.

^③ [英] 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8-30 页。

教信仰、妇女地位、文学艺术标准等各个方面，论证英国社会在性质上已完全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社会，认为生产资料所有权的不断弱化致使根据所有制形式来定义和区分社会性质已变得不合时宜，“而根据平等、阶级关系、政治制度来判定社会性质似乎更有意义”^①。因此，他试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重新界定社会主义的目标和任务。

克罗斯兰还指出，英国的上述转型实际上早在二战前就开始了，尽管当时的右翼政府延缓了这一进程，却未能完全阻止它的发展，而工党在战后的上台执政则大大加快了这一进程。他断言，至迟到1951年，英国社会已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资本主义社会，它在本质上已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②。在《新费边文集》中，他曾把这种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的社会称之为“国家主义”，认为这一名称准确反映了资本主义发生的最本质变化，即由自由放任转变为国家控制。在“国家主义”社会里，高就业率、大量的社会服务以及财富与机会不平等的减弱，使整个社会更加人性化和体面，而经济权力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分散到新经理阶层、国家、股东以及有组织的工人手中，则使中间阶层迅速崛起，从而大大缓解了阶级之间的对抗。但后来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一书中，他又否定了“国家主义”这一名称“我曾尝试去探寻一个合适的名称，并将这种新社会称为‘国家主义’。但是几经斟酌，觉得这仍不是理想的选择。因为这个词现在已经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美国，但是在那里它只是作为‘集体主义’的同义词，这不是我想要表达的含义。这样一来，我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也不想再做这样的努力了。然而我相信，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肯定需要一个不同的名字，以区别于经典资本主义。”^③ 尽管克罗斯兰在放弃“国家主义”这一名称后，并没有明确把20世纪50年代后的英国称为“后资本主义”社会，但其思想理论的后继者以及后来的研究者，仍根据他对英国社会性质新变化的论述，将这种非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称之为“后资本主义”。

二、克罗斯兰“后资本主义”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通过对英国社会现实的考察，克罗斯兰首先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将崩溃的结论，认为资本主义非但没有衰退，反而在继续扩张，不仅社会总产出稳步提升，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也持续提高。1952年他在《新费边文集》指出，英国1938年的国民净收入是1870年的3.5倍，人均收入增长2.5倍，因此他审慎地认为“战前资本主义经济的良好发展势头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经济或社会体系，也不意味着它能够继续保持稳定和充分就业，只是说明资本主义并不会

① [英] 安东尼·克罗斯兰 《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

② C. A. R. Crosl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in *New Fabian Essays*, London: Turnstile Press, 1952, p. 42.

③ [英] 安东尼·克罗斯兰 《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自动崩溃。”^① 1956年他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进一步指出，尽管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发展速度放缓，但其经济仍在发展，实际国民收入增长了31%，人均收入增长了21%，即便在大萧条期间也没有停止发展，“没有出现日益贫困化的证据”；特别在二战结束后的10年间，英国经济“表现非凡，充分就业代替了萧条，不稳定大大减少，增长率更高”，因此他认为英国经济将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其“未来特征将极可能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②。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推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掌握着绝对经济权力的资本家阶级将对整个社会实行有效控制，通过技术发展和市场垄断实现这一权力的持续膨胀。克罗斯兰则认为，战后的英国资产阶级实际上已丧失了这种支配地位，其经济权力不是越来越加强，而是越来越弱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府权力的加强是资产阶级经济权力弱化的最直接、最明显的表现，也是最重要的原因^③。马克思认为国家只是统治阶级的代理机构，其权力非常有限，任何加强国家控制经济或福利改革的尝试都会受到资本利益的限制。克罗斯兰认为，英国的发展现状已证伪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战后英国政府通过财政手段承担充分就业、经济增长、收支平衡、收入分配等职责，大大扩展了自己的权力，公共部门（包括国有企业）“雇佣了总就业人口的25%，负责总投资的50%以上”^④；政府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影响私人企业的生产决策，以及通过货币、立法、赎购等方式对私人企业进行直接控制，从而使“企业受到政府行为的限制”^⑤，这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不可想象的。通过这些手段，政府还可以对收入分配施加影响，并大致决定社会总产出在消费、投资、出口和社会支出之间的分配。另一方面，基础工业的国有化大大增强了政府的权力。从1945年起，工党艾德礼政府通过一系列国有化法令，将大批煤炭、铁路、电力、运输等企业收归国有，1951年起又对苏格兰银行和部分钢铁工业实行国有化，使英国工业的大约20%实现了国有化^⑥。国有化使英国工业的经济决定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移到公共经理人阶层，而政府则对这些经理人拥有明确的法律权力，因此必然造成资产阶级经济权力的削弱和政府经济权力的相应增强。

其次，企业内部权力已由管理者向劳动者转移。这一转变首先得益于充分就业所引起的卖方市场，继而导致雇佣双方力量均势和劳资关系的改变。对工人而言，他们不再担心被解雇，即便遭到解雇也依然有充分的就业机会；对雇主而言，由于

^① C. A. R. Crosl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in *New Fabian Essays*, London: Turnstile Press, 1952, p. 34.

^② [英] 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③ See Mark Wickham-Jones,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and New Labour: An Appraisal*,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No. 2, 2007, pp. 226-227.

^④ [英] 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⑤ C. A. R. Crosland, *The Conservative Enemy*, London: Janathan Cape, 1962, p. 56.

^⑥ See Matt Beech and Kevin Hickson, *Labour's Thinkers: The Intellectual Roots of Labour from Tawney to Gordon Brown*, London • New York: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7, p. 146.

缺乏大批失业者，他们也不愿随意解雇工人。此外，充分就业的现实改变了劳资双方对待罢工和停工的态度。工人可以坚持更长时间的罢工，而雇主出于利润考虑则尽量避免罢工或停工，因此工人的权力相对增强，资本家阶级的权力相对削弱。另一方面，1951年英国工会的数量达到732个，会员人数达928.9万^①。随着工会组织的日益强大，劳动者集体谈判的力量大幅增强，因而“雇主支配工人的权力无疑受到工会极严厉的限制，连那些与维持纪律的权利和义务有关的权力，也只能在工会所能容许的范围内行使”^②。

再次，管理革命使得资本家阶级的经济权力向经理阶层转移。克罗斯兰指出，“现代企业的日益规模化、复杂化以及技术的精细化，使经济决策越来越具有专门化的特征”^③，导致公司所有权与管理权日益分离，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等虽然并不拥有对公司的最终权力，但他们在公司决策中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大。经营权与管理权的分离、股份公司发展所造成的股权分散化以及融资需求的增长，使资本家阶级不再盲目追求利润最大化，除利润外，他们也通过参政、推行合作制或分红制、捐助等方式来获得社会声望。公司经理拥有管理公司的权力，他们为整个公司而非仅仅为资本家的利益而工作。这些变化都表明了资本家阶级经济权力的削弱。

最后，资本主义经济持续扩张所带来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管理革命所产生的经理阶层，使英国各阶级进一步分化，阶级对抗减弱，阶级关系缓和，并未出现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紧张的阶级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资产阶级时代的一大特点就是阶级对立简单化，“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④。早在1940年克罗斯兰就指出，马克思忽略了劳动和资本的不断分化，“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社会的阶级划分并非如马克思设想的那么简单和清晰”^⑤。他认为，战后英国经济的繁荣导致了工人工资水平的提高，改善了工人生活水平，使工人队伍不断分化出熟练工人、专业工人等一系列等级，其收入、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都不同于传统工人阶级，与雇主的关系也不再是激烈对抗性的。管理革命所造就的经理阶层有更多的选择权，他们不再单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不再局限于满足公司所有者的利益，不再仅仅根据市场行情去追求那些经济的、社会的或心理的目标^⑥。也就是说，除谋取利润之外，他们也更多考虑社会影响、职业尊严、特权、稳定性等非经济因素。作为新兴阶层，经理阶层不再具有鲜明的阶级身份，不像原来的资本家那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能够为了共同目标与工人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为不同阶级

① <http://www.ihuawen.com/hw/article/18596.html>.

② [英] 盖茨克尔《社会主义与国有化》，李奈西译，商务印书馆1962版，第15页。

③ [英] 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版，第401页。

⑤ See David Reisman, *Anthony Crosland: The Mixed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 5.

⑥ C. A. R. Crosland, *The Conservative Enemy*, London: Janathan Cape, 1962, pp. 87-88.

之间的关系仍是对抗性的，就不合时宜了”^①。

克罗斯兰关于资产阶级权力转移的观点受到党内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英国的资本主义并未转型，那些拥有公司财产的人仍然拥有绝对权力，因此，如果不进一步扩大公有制的范围，就无从实现社会主义^②；经理阶层其实仍是资本家，他们拥有大量的公司股票，仍受利润动机的驱使；即便在所谓的福利国家，企业也是为了从工人那里获得更高的生产率^③。不过克罗斯兰认为，这些批评实际上与他的分析并不相关，他相信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将促使私人企业以一种对社会负责的方式来运行，而这正是当代英国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本质区别。关于利润，克罗斯兰并非认为它不重要，因为利润仍关乎企业经理阶层的酬劳，决定着他们的权力和地位，但他呼吁社会主义者改变对利润的传统偏见，因为“在任何社会，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只要这个社会是上升的、具有活力的，那么，利润就应该是一切商业活动的根本动因”，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只是“使利润功能发生了微妙变化”，并“进一步引发了利润分配的变化和追求利润程度的变化”^④。

三、对克罗斯兰“后资本主义”论的评析

克罗斯兰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富于奉献精神的天才，只有那些道德上的侏儒或者缺乏想象力的人，才会讥讽他的伟大”^⑤；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新时代的英国已不同于以往，左派所固守的、以所有制来分析社会性质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⑥。克罗斯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以及他的社会主义观，明显受到伯恩斯坦、卢西恩·洛拉和伊万·德宾的影响。

早在1940年7月，克罗斯兰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就表示，他“正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重大修正”，并立志“成为当代的伯恩斯坦”^⑦。他继承了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传统，区分了社会主义学说的目的与手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主义观。他对资本主义概念的重新界定，则直接受到卢西恩·洛拉《马克思主义与民主》一

① Mark Wickham-Jones, *Economic Strategy and the Labour Party: Politics and Policy-making, 1970-1983*,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6, pp. 16-17.

② See Matt Beech and Kevin Hickson, *Labour's Thinkers: The Intellectual Roots of Labour from Tawney to Gordon Brown*, London: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7, p. 161.

③ See Geoffrey Foote, *The Labour Party's Political Thought: A History*, London: Croom Helm Ltd, 1985, p. 219.

④ [英] 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⑤ [英] 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⑥ David Reisman, *Crosland's Future: Opportunity and Outcom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 9.

⑦ See Matt Beech and Kevin Hickson, *Labour's Thinkers: The Intellectual Roots of Labour from Tawney to Gordon Brown*, London • New York: Tauris Academic Studies, 2007, p. 145.

书的影响,这本书被他称作是自己“生命中的新救世主”^①。洛拉认为“经济学家和卡尔·马克思所界定的资本主义正在消失,当今社会的经济结构与十九世纪的自由资本主义大不同,差异大于相似之处。”洛拉把这种新资本主义命名为“国家资本主义”,并指出“随着积极的资本家的消失,其经济生活中的真正作用也正被高薪的工人所取代,决定权转移到拿薪金的管理者手中,股权所有者变得越来越消极和分离。”^② 克罗斯兰的“国家主义”概念和“后资本主义”论,无疑受到洛拉的直接影响。伊万·德宾是20世纪40年代英国工党最有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他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对抗理论,反对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抨击统治阶级的经济权力,总结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八大结构性变化,其中一些观点被克罗斯兰直接继承下来,如集体谈判权的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坚挺、中间阶层力量的增强、股权分化带来公司法定所有权与行政管理权的分离^③。更为重要的是,德宾认为经济增长并不仅仅是经济效率提高的结果,还是社会进步的原因,持续的经济增长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组成部分^④。而在克罗斯兰的“后资本主义”论中,传统资本主义在英国实现转型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英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正因如此,有西方学者指出,克罗斯兰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其实不过是“伊万(的书)的续集”^⑤。

“后资本主义”论是克罗斯兰社会主义观的逻辑起点,是他修正马克思主义和提出建立以社会福利、平等为基础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依据。通过对战后英国社会新变化的分析,他认为并没有出现马克思所预想的“无产阶级的日益贫困化”,经济的发展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英国已不是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人们需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社会主义及其价值和理想。他把社会主义理想归结为“关注社会福利,实现一个平等而无阶级的社会。”^⑥ 后来在《当代社会主义及其他问题》一书中,他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平等。”^⑦ 他认为,在“后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制形式的重要性已经弱化,不再是判断和区分社会性质的标准,公有制也不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和特征了。英国工党传统上把国有化视为社会主义的首要原则和本质特征,认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和唯一途径,这实际上混淆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和手段,国有化不是社会主义的目的,而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之一。工党在战

^① See Catherine Eliis, *The New Messiah of My Life: Anthony Crosland's reading of Lucien Laurat's Marxism and Democracy* (1940),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No. 2, 2012, p. 189.

^② See David Reisman, *Crosland's Future: Opportunity and Outcom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 12.

^③ E. F. M. Durbin,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Socialism: An Essay on Social Policy*, London: George Routledge & Sons Ltd, 1940, p. 3.

^④ David Reisman, *Anthony Crosland: The Mixed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 91.

^⑤ Mark Wickham-Jones,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and New Labour: An Appraisal*,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No. 2, 2007, p. 232.

^⑥ [英] 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 轩传树等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第73页。

^⑦ Anthony Crosland, *Socialism Now and Other Essays*, edited by Dick Leonard, London: The Trinity Press, 1974, p. 16.

后的执政实践，也暴露出国有化政策和管理的诸多缺陷，国有企业既没有表现出高于私有企业的效率，也未能比私有企业更好地促进平等，因此“国家拥有所有企业资本并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建立社会平等、增加社会福利、消除阶级差别的条件”^①，相反，国家应通过财政、货币等间接手段实现对社会和企业的控制，进而影响分配、促进社会平等，而不是直接控制生产资料 and 下达生产命令。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克罗斯兰的“后资本主义”论在战后民主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只具有阶段性意义^②。二战以后，西方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新变化，使一些社会民主党人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社会性质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观点已经过时，国有化不再是、也不应该是社会主义的目标，需要重新分析和概括社会主义的目标和理想。克罗斯兰的“后资本主义”论、关于国有化性质的描述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福利和平等的社会主义目标，就是对上述问题的一种回应。从这一意义上说，他的思想观点促进了英国工党以及西欧其他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更新，因而在民主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

不过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克罗斯兰的“后资本主义”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其局限性。早在1941年，克罗斯兰就宣布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大部分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它们的前提不再成立了”^③。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他更是声称“不管是在实际政策方面，还是对于我们社会的正确分析，甚至是适当的概念工具或框架，马克思很少或者说根本没有为当代社会主义者提供什么现成的东西。他的预言，几乎毫无例外地没有得到证实；他的概念工具，现在也已不合时宜了。”^④但实际上，他的所谓“后资本主义”论以及“修正”社会主义观，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参照的，正如有西方学者所指出的，他“通常是透过马克思的理论霸权和马克思主义在组织上的主导地位的棱镜来考察社会主义发展的”^⑤。无论如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进步概念经得起任何修正主义的挑战，也是社会民主主义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以克罗斯兰为代表的英国“修正”社会主义者，其一大理论缺陷就是仅仅“冲淡”了传统社会主义，但并没有取得任何重要的理论进展，没有建立起新的理论框架^⑥。不仅如此，克罗斯兰认为英国社会已经克服了传统资本主义的弊端和固有矛盾，可以在不改变社会性质的条件下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继而实现财富公平分配、充分就业等直接目标，最终实现社会平等这一社会主义最

① [英] 安东尼·克罗斯兰 《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3页。

② 参见谢宗范 《凯恩斯、熊彼特、克罗斯兰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剖析》，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0年第4期。

③ David Reisman, *Crosland's Future: Opportunity and Outcom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 6.

④ [英] 安东尼·克罗斯兰 《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⑤ See David Reisman, *Crosland's Future: Opportunity and Outcome*,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 9.

⑥ 参见 [英] 唐纳德·萨松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二十世纪的西欧左翼》（上），姜辉等译，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版，第284页。

终目标，在理论上也是站不住脚的，正如唐纳德·萨松所言：如果资本主义能够促进增长，解决积累问题，那么社会主义就可以适可而止，人们就可以“在取消消灭资本私有制的情况下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但“新修正主义者的悖论在于，虽然他们不再相信‘社会进步的连续向上发展’，但他们承认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是‘连续向上’增长的”^①。在英国工党内部，克罗斯兰的“后资本主义”论也受到来自左右两派的批评：右派质疑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方式的有效性和工会对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认为他对经济发展的期望太过乐观；左派则认为他低估了资本主义的力量，夸大了国家控制资本主义的能力^②。

从现实来看，克罗斯兰的“后资本主义”论是当时英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产物。以1945—1951年工党政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基础，英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继续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共识政治下的保守党政府仍然延续了工党政府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继续推行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政策。在《社会主义的未来》发表的那一年即1956年，英国的失业率是1.2%，物价上涨3.3%，而工人工资则上涨7.6%，国际收支处于顺差状态，国民经济增长率为2%^③。在此背景下，克罗斯兰断言英国经济将会长期快速发展下去，甚至认为“按照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残存的基本贫困在十年内就会消失”^④。在1960年出版的《社会主义的未来》日文版的前言中，他仍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以经济作为主要目标对于社会主义政党来说越来越不合时宜了^⑤。然而，60年代末、70年代初英国经济再次出现的危机表明，他对英国经济形势的估计太乐观了，这迫使他在《社会主义的未来》第二版序言中不得不修改自己先前的判断。事实上，英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不会自动带来公平分配和高福利，再加上工党在竞选中的连续失利，使克罗斯兰的“修正”社会主义理论在党内逐渐边缘化了。

克罗斯兰的“后资本主义”论认为，股份公司制的出现和管理革命所造就的经理阶层分散了资产阶级的权力，使资产阶级已丧失统治地位，这一判断也不断受到质疑。有学者指出，英国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认识，主要受美国修正主义理论的影响，特别是伯利、米恩斯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理论以及詹姆斯·伯恩哈姆的管理革命理论^⑥。战后英国“丰裕社会”的发展，促使克罗斯兰对资本主义性质的转变得出了比前者更进一步的结论，认为在发生了管理革命和实行了混合经济的英国社会中，生产资料所有制被股权所淡化，资产所有者将不再对企业决策

① [英] 唐纳德·萨松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二十世纪的西欧左翼》（上），姜辉等译，科学社会主义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1—282页。

② See John Mackintosh, Has Social Democracy Failed in Britain?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No. 3, 1978.

③ See David Reisman, *Anthony Crosland: The Mixed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7, p. 56.

④ [英] 安东尼·克罗斯兰 《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⑤ See Mark Wickham-Jones, *Economic Strategy and the Labour Party: Politics and Policy-making, 1970-1983*,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Inc., 1996, p. 19.

⑥ 参见 [英] 戴维斯 《资本主义新变化与新左派的“丰裕社会”之争——论英国新左派在社会主义论战中的思想贡献》，载《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享有绝对权力，大部分经济权力转移到了职业经理人手中，这意味着有产阶级已“不再享有传统的资本能力”^①，其经济权力被削弱了。与传统资本主义相比，50年代的企业经理们与财产的关系也大不相同，过去的资本家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现在的经理们不是企业资产所有者，他们不再单纯追求企业利润，同时也关注自身社会地位和保障，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对福利计划和良好的劳资关系也更有兴趣^②。对于这一说法，新左派经济学家迈克尔·巴雷特·布朗提出质疑，他指出，为避免恶意收购和维持股价，经理们仍需追求利润最大化^③。特别是克罗斯兰据此认为资产阶级已丧失统治地位，甚至宣称“现在还谈论什么资本家统治阶级显得荒谬至极”^④，这实际上夸大了西方资本主义一些新变化的影响，掩盖了其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

(责任编辑: 金淑霞)

① C. A. R. Crosl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in *New Fabian Essays*, London: Turnstile Press, 1952, p. 36.

② Geoffrey Foote, *The Labour Party's Political Thought: A History*, London: Croom Helm Ltd, 1985, p. 213.

③ Mark Wickham-Jones, *The Future of Socialism and New Labour: An Appraisal*,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No. 2, 2007, p. 231.

④ [英] 安东尼·克罗斯兰 《社会主义的未来》，轩传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